

馬華文學評論數據庫

赤道回聲

書名：《馬華文學讀本 11：赤道回聲》

主編：陳大為、鍾怡雯、胡金倫

出版：萬卷樓出版社（台北）

時間：2004年1月

八〇年代校園散文所呈現的 憂患意識

* 潘碧華

一、前言

一九八九年，馬大華文學會文集之三《坐看雲起時》封底的「宣言」，可作為本文的序幕：

划過歷史的長河之後，涓涓細水應流向浩瀚汪洋。

然而我們如何在遼闊的兩岸搭起一座橋樑呢？這有待我們以一生的摯愛將綠意嵌入紮根的方土。紮根之後，豐盛的枝頭該往哪一方藍空舒展？或只安於傘下的庇蔭？

遠航的舵手們，當山窮水盡，你選擇與雲騰空抑或滯留水窮處？

或許，我們都應成為逆流而上的涉水者，在水湍風緊的年代颯然前航。¹

八〇年代是大馬華社憂患意識特強的時代，無論是政治、經濟、教育，或文化，華人的權益如江河日下，維護母語教育和捍衛中華文化的堡壘，一一兵敗如山倒。招牌事件、茅草行動、政府機構行政偏差，華社人人皆能感受到勢不如人，任人左右而無能為力改變的局勢。

八〇年代的華社，充滿頹喪黯然的情緒；作為社會縮影的大專院校，華裔學生不免也有同樣的感受。他們通過正式與非正式的活動，力圖在劣勢中，傳達他們的憂患和期望。

這一個時期，大專院校前所未有的剛好雲集了一批文學愛好者，或結社，或

¹ 見馬大華文學會編《坐看雲起時·宣言》（馬大華文學會89/90年文集），吉隆坡：馬大華文學會，1991封底。

出書，作者之眾與作品之多，造就風氣即盛的校園文學。處於風起雲湧的時代，在他們的作品中，也不免反映出社會的不安的面貌和人們焦慮的情緒。

這時期的校園文學所表現的題材多樣，從個人的風花雪月到大我精神的作品皆有。而最能夠和八〇年代脈搏相應扣的，便是本文所要討論的民族文化憂患意識。在各種文體中，散文是大專院校生擅長且成績不菲的一環，因此本文專以八〇年代的校園散文為對象²，探討其中所呈現的憂患意識。

二、淑世情懷和文化使命

八〇年代期間，馬華文壇出現許多具有憂患意識的作者，其作品中常常帶有「孤憤」的情緒。溫任平在祝家華的《熙攘在人間》序文中，提到所謂「孤憤」之情，非八〇年代獨有，而是出自於作者「看到社會不合理的現象，有感而發的不平之鳴，字裡行間恆彌佈著一分淑世的關懷。也許由於作者意識到一己力量之有限，匡扶乏力，因此下筆行文格調偏於低沉，帶點孤憤意味」。溫氏又說：

這種孤憤之情，我並不陌生，因為家華的感受我也曾感受過。而在我早年的散文如〈暗香〉、〈朝芳〉篇有曾用另一感性形式表達過。我甚至要說，溫瑞安的〈龍哭千里〉、何啟良的〈那一抹眼神〉、方昂的〈鳥權〉、游川的〈蓬萊米飯〉、傅承得的〈趕在風雨之前〉，加上祝家華、辛吟松、何國忠諸子近年來的作品，寢寢乎已足於形成馬華文學另一個獨特的憂患意識傳統。這些作家關心民族處境、國家命運，文化使命感強烈。³

從溫序中，我們大致上可以看到憂患之所以籠罩八〇年代文壇，是出於那時代的作者具有淑世的關懷，他們為不公平現象而憤怒，也為民族的權益和文化的傳承憂慮。由於不甘於現狀，心生「孤憤」之情；由於憂慮，行文不免有意識地注入沉痛的感情，以低沉的語調敘述族人的當前狀況，表達內心憂慮如焚，心痛如絞

² 在籍大專生出版合集和個人專集的風氣始於一九八五年，即是散文合集《青色的衝激》，由麻坡朋友出版社出版。此後，書出不斷。但大專生創風氣卻早在一九八五年之前，本文引文來自已出版的書籍和雜誌，皆在八五年之後，但所收集文章，部分是八五年之前散見報章的創作。

³ 溫任平〈懷念一個江湖的遊離與溫馨〉，收入祝家華《熙攘在人間》，吉隆坡：十方，1992，頁5-6。

的感覺。這種感情不只是校園文學中顯現，實際上整個八〇年代的馬華文壇，都瀰漫著如此具有壓抑性的情緒⁴。

溫在文中所提到的幾位作者，都具有作為知識分子的文化認知感，處於多變的年代，他們站在「關心民族處境、國家的命運」的立場，為命運多舛的大馬華人¹社會發出痛心疾首的呼聲。他們不但有深厚的文化根基，也備有感性的文學素養，作品中顯現出一股大我的「文化使命感」。

這種從個人的感知，引發出來對民族前途、文化危機、社會現象關心的情感，形成八〇年代馬華文學作品中獨特的「憂患」意識。而八〇年代的校園文學作者，良好的教育與惡劣的處境，很容易地讓他們與這一股意識達至共鳴。大專法令嚴格的限制，並不能阻止他們以文學地方式來表達內心的不滿和悲憤。

何國忠在一九八八年馬大華文學會文集《長廊迴響》中，以顧問身分發表的〈時代的眼睛〉，分析大專生憂患情緒的產生，和在文化覺醒方面的歷程：

十多二十年來在經濟、政治、教育等方面的節節敗退，華人的心理普遍上都存在著非常強烈的挫折感。大學生也看書讀報，對於外面的事不可能說是毫無知覺的。他們是社會的一分子，自然也很了解人民的生活，關心他們的希望和痛苦。我們常說大學是社會的縮影，這一句話一點都沒錯。在社會中所發生的一切事，裡面幾乎也在發生著。外面有行政偏差的事年，裡頭一樣也不能倖免；外邊有種族兩極化的現象，裡頭照樣不能避開。因此華社中一切不如意事，大學生是能心領神會的。⁵

此文的小標題為，「以馬大華裔生為例談大學生自覺的問題」，文中所提自然以馬大的現象為主。但民族文化是與整個社群水乳交融，難以分開的，校園外面的社會固然如此，馬大和其他的大專院校也是如此情況⁶。大學生意氣風發，對自由

⁴ 除溫序中提到的何啓良、方昂、游川、傅承德、祝家華、辛吟松、何國忠外，尚有小曼、鄭雲城、唐珉等人，創作量極豐。

⁵ 何國忠〈時代的眼睛——以馬大華裔生為例談大學生自覺的問題〉，收入馬大華文學會編《長廊迴響》，吉隆坡：馬大華文學會，1988，頁13。

⁶ 本文題為「校園散文」，實際上接下所討論的，卻以馬大的散文創作為主，並非其他大專沒有作品，而是馬大的文學風氣最盛，作品較多，水準也較高，可讀可引用的比例也比較高。

民主充滿熱情，希望能夠在學期間，締造公平自主的社會。但是，大學行政上的偏差、大學裡種族的兩極化，讓他們面對錄取學生的固打制、及格分數不同標準、文化活動的阻礙，以及語言運用的限制等等，一一打擊華裔大學生的信心，使他們從積極變成消沉。

何國忠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他在大學期間，所看到的一般大學生的心理和社會的巨變息息相關。他說：「根據我的觀察，大半早熟又有理想的年輕人的成長過程都是在憂患、挫折、不滿、迷茫中交集而成」⁷。這些年輕人擠入大專院校之後，以為學術環境可以給他們實現理想的機會，誰知他們的理想卻在現實的環境下受挫。

如同大部分有理想的學生一樣，校園作者群中也產生對現實的不滿以及對前景的迷茫，促使他們在思想方面的探索，也是許多校園文學作者創作的原動力。

三、民族危機與文化覺醒

比起同期的大專生，校園作者對於教育弊病和政治狀況，有著敏感的觸覺。他們在求知的過程中，更渴望能夠找到思想的出路。他們看到許多同學，對不平的現況麻木不仁，對民族的困境無動於衷，而心生憤慨。

大學教育原本有著提升思想深度的功用，但許多大學生表現得隨波逐流，只求一紙文憑，不作文化上的思考和進修。夏紹華在〈生命不留空白〉一文中，對自己的生命有一定的認識之餘，也提出對大學教育是否發揮功用的質疑：

「……所以我感到悲哀，失望，對這一群迷失、貧乏的大學，不禁使我對當今的教育制度感到迷惘，是哪兒出錯了，是那哪兒不妥當，誰又嚴謹認真地質問過呢？」⁸

當然，這批校園作者並不停在迷惘和失望的情緒中，他們積極參與校園文化活動，努力創作，了解本身在社會上的定位，更重要的是他們對民族危機的關心，

⁷ 何國忠〈論大學生的思想困境〉，收入馬大華文學會編《馬大人》，吉隆坡：馬大華文學會，1991，頁1。

⁸ 夏宇舒（夏紹華）〈生命不留空白〉，收入馬大華文學會編《大專青年系列之二：飛向九十年代》，吉隆坡：吉隆坡暨雪蘭莪總商會，1989，頁75。

以及對文化方面的省思。

陳鐘銘的〈魘的延伸〉寫的是當時華社的困境和本身對文化傳承的省覺，讓我們看到一個華裔大專生在求學過程中，有著怎樣的理想：

跑著，跑著，似乎越跑路越長，也似乎越跑越無路。我的路呢？我的小徑
哪裡去？沒有人回答，只隱隱約約的見到野草在前頭的、隱約可辨的小徑
上狂野的在滋長，在冷笑。我的恐懼使我感到自己必須在它們抹去之前離
去。我不能讓這些野草淹沒小徑、淹掉我的信心和勇氣。⁹

文中所提到的「野草」和「路徑」分別指惡劣的環境和民族文化路向。野草性惡和侵略性，有計畫性的大舉淹沒了族人前輩走出來的小徑，作者循著前人方向追隨在後，然而野草生長速度太快，以致淹沒了小徑，作者一時找不到他應走的方向。在慌張迷失的時候，作者恐懼前人的足跡就此絕滅，作者心中雪亮，絕不能讓「野草淹沒小徑、掩掉信心和勇氣」。這種繼迷失後「覺醒」，有意識地以傳承文化為使命的主題，是校園文學表現的特色之一。

校園文學的作者基本上是有意識地把「使命感」帶入作品中的，他們將生活中的所見所感，有意無間與華社當前局勢掛勾，表層是說景物，實際是另有所指。讀八〇年代的校園文學或馬華作品，讀者需掌握八〇年代的時事知識，才能夠將他們的作品作準確的詮釋，探知其中含有暗示比喻的成分。

林幸謙的作品以晦澀但意象飽滿見稱，他常將文化感和憂患意識帶入文章。如在〈大地無告〉這篇散文中，他這樣寫眼前的河水：

一條河流在大橋底下的亂石間奔騰，向著雨霧和野煙處嘩嘩激滾，以墾荒
的精神，唱起山林的暮曲，在野岩亂木間覓一條出山的方向，便毫不猶豫
的往南中國海洋的方向前進；這一去，恐怕永遠都不能回返大陸了。¹⁰

描寫河水之餘，又「忍不住」借題發揮一番，是林幸謙作品的特色。他將一去不回頭的河水，隱喻早期南來的中國人，航向南中國海的時候，便有心理準備斷了中國大陸之心。他們化身南洋華人，在異鄉土地上披荆斬棘，開墾土地，把異鄉視為國土的精神。此篇散文全篇皆是如此「情景交融」的寫法，借回家鄉（作者

⁹ 陳鐘銘〈魘的延伸〉，收入馬大華文學會編《第四屆全國大專文學獎專輯》，吉隆坡：馬大華文學會，1990，頁25-26。

¹⁰ 林幸謙〈大地無告〉，收入潘碧華編《讀中文系的人》，雪蘭莪：澤吟，1988，頁65-70。

出生地)的路程,入眼所見皆是大好山河,強調大馬華人對土地的熱愛,但不受承認為土地之子的悲憤。文中每一場風景都另有對民族危機、文化沒落、國家認同的省思,全篇的民族文化意識非常明顯。

有意識性將文化憂患寫入作品中的情況,在這時期的校園文學作者群中,比比皆是。有的直抒,有的暗喻。比如陳湘琳在〈有一種聲音〉中,與音樂,又與文化掛勾,寫來情感深沉又令人深思,文化的使命感不能說不強烈的:

他們說音樂是一個浩瀚無垠的空間,不輟的心志卻絕對是種流電,可以一寸一寸的流過、穿過、越過歷史的距離,把空間充實豐富起來。(那麼我們是不是也可以把文化、以關懷、以及對祖國的大愛,一寸一寸地收拾我們散落零碎的舊山河呢?)

有一種聲音就是這樣響起來的,老師。在走路的時候,在一大群朋友爭論執著不願輕易放棄的時候突然響起來。也許不怎麼鏗鏘,但卻是清清楚楚的。像您呵,老師,像您訴說我們的先輩們,怎樣願意以生命和血汗,作上一代的見證——我們亦希望,我們會是這一代的聲音——可以是古箏,可以是二胡,可以山高流水,或者也可以是躍馬奔騰。¹¹

「歷史」、「文化」、「祖國」、「山河」、「執著」、「不輕易放棄」、「先輩」、「生命」、「血汗」、「見證」等,都是憂患意識強烈的文學作品中常用的字眼,表明這一代的華裔子弟渴望受到承認和落地生根的願望。

再如何國忠的〈登山感懷〉,寫於「三保山事件」之後。證徵山發展的風波雖已平息,但登山時還是不免引發文化危機的感懷,和內心的隱憂:

眼前所見,只是墓塚處處,雜草叢生,偶見變色龍、蛇鼠類從前面跑過。

眺眼遠望,天色茫茫,使我對民族事業前景的黯淡而感到殼棘徬徨。¹²也許環境壓力,無時無刻困擾著大學生的思維。於是,不管虛實,無論動靜,觸目皆與民族文化有關。這是許多具憂患意識的校園作者的自然而然的反應,也是共相。

由於有意識的呈現憂患,有些作品就不能顧及情景交融,在文章轉折上,不免讓人看到明顯的刻意帶出憂患的痕跡,造成這些文學作品使命感雖然飽滿,美中不足的是,文學性無形中就被削弱許多。

¹¹ 陳湘琳〈有一種聲音〉,收入《飛向九十年代》,頁93。

¹² 何國忠〈登山感懷〉,收入《青色的衝激》,柔佛:朋友,1986,頁42。



四、風雨飄搖與山雨欲來

八〇年代的大專生在思想上，還深受七〇年代的大專法令的桎梏，陰影所及，連文學的表現力也為其所制。加上八〇年代「茅草行動」大逮捕的震撼，許多作者都不敢向宗教、文化、政治敏感課題挑戰。偏偏在八〇年代的大馬國土上，最具爭論性的，除經濟問題外，就屬宗教文化和政治課題。

為了不觸法律的禁忌和自保，各種象徵的符號大量的在文學上運用，以避開法律的羅網，而且又可宣洩內心的不滿和悲憤。其中，「風雨」和「燈火」是大專文學中常出現的象徵符號。

八〇年代，許多不利於華教的政策實行，如華文招牌事件、華小高職不諳華語事件、華文不列為中學會考必考科目事件等，使政治立場已告分裂的華社雪上加霜。外在的壓力，內在的憂患交加，華社進入「風雨飄搖」的時代，文化危機更見明顯。

校園作者慣於用「風雨」比喻週遭的壓力，泛指不利於華社的政策，無處不在，無時不伺機壓境而來。作為常受「風雨侵襲」的一員，校園作者時時表露出「山雨欲來風滿樓」的憂慮，語調不無準備面對「風雨摧殘」的悲壯。他們感嘆「風雨的無情」，也悲嘆「風雨的強暴」，壓迫在馬來西亞土地上無「擋風遮雨」的子民。比如以下這些「風雨交加」的文字：

在這麼一個安靜的世界裡，即有綠色的土地，也有灰色的大海，而走在長長路上的人群，只要盡過心力，每個人原都有權力分享這沿路的富足喜悅。是不是這樣的呢？（儘管落著與刮著風，烏雲在海上壓得海色變灰：一片灰色遼闊的大海）¹³

我不期然的想起國家的民主、自由、人權……這些人類浴血奮鬥的來共同價值，在新的抗議浪潮中浮沉、搖擺，就像中華民族在這塊土地上以血汗建立的家園，在風雨飄搖中不知往哪裡去……¹⁴

¹³ 陳湘琳〈人在風雨中〉，收入馬大華文學會編《有一座山》，吉隆坡：馬大華文學會，1989，頁68。

¹⁴ 祝家華〈江山有待〉，《熙攘在人間》，吉隆坡：十方，1992，頁27。

用過晚餐後，與也停了。人家常說，愈是急促猛烈的風雨，就會愈快停止。可是，在這塊同是用血汗賺取生活資本，卻獲得不同待遇的土地上，那時時摧毀所謂次等民族尊嚴的強暴風雨，它又將會到何時才能停止呢？¹⁵

如果說大學是一座象牙塔，那麼我們就是活在風雨屋檐下的一群。在靜靜的圖書館裡，當我正在知識海洋裡徜徉時，窗外偶而傳來雷雨聲，霎那內心的掙扎就如划過長夜的電光，時長時短，忽明忽滅，曲折而深刻。¹⁶

風雨之下，即使是安身在象牙塔中，也感受到風雨的威力。大專生一邊沉醉於風景優美，浩瀚書海之中，一邊接收來自校外的訊息。耳中所聞，眼中所見，親身所遇，無不叫他們憂慮難受。

所幸他們都是有機會通過學術的訓練，對文化的沒落、民族間的衝突、國家的前景，都能作出深刻的省思。他們對於「風雨」來襲的目的洞悉分明，因此憂患暗生。

大學裡行政的偏差，對非土著的不公平待遇，關於母語教育的運用以及有關文化活動受到的壓制，形成大專生不衡的心理。他們質問不公平的原由，他們自認已經把本土當作故鄉，卻得不到身分上的承認；他們因此感到無助和茫然。

但是，他們並不因此逆來順受，沉默地接受一切。在行動上他們是消極的，像他們在校園外的族人，在各種可以致人於牢獄的法令之下，成為敢怒不敢言的一群；在思想上，這一批受過大專教育的年輕人，努力地通過文字，紀錄了他們年代不公平的現象。

五、憤怒控訴與薪火傳承

風雨雖大，許多作者內心更熾熱，抗衛文化之心形成一股風氣。這一類作品可以大量地在已結集的校園文學中看到，如當時大專生自組的澤吟書坊和文采出版社，便出版了一系列校園叢書，各大專華文學會出版的文集，這種憂患意識處處可見。我們甚至可以說，憂患意識是促使他們寫作、出書的重要動力。

¹⁵ 黃秀美〈那個午後的心情〉，收入《讀中文系的人》，頁59。

¹⁶ 余月美〈這是一種怎樣的心情啊〉，收入潘碧華等合著《只在此山中》，雪蘭莪：澤吟，1989，頁11。

馬大文集之三的《有一座山》，便是帶著這樣的使命感為出發點，此文集的序中的以下這一段話，可以作為他們的「使命」明證：

我們心中其實都有一座山。一座山在我們心頭重重壓著。當我們站在山上遠眺，看著我們許許多多的史實在我們腳下任人踐踏，再如雲霧飄散流失的時候，你甘心嗎？¹⁷

這時期的大專生，在憂患意識抬頭的大前提下，對本國的政治局勢、文化危機、種族兩極化、民主真諦有了深一層的認識。他們不再為表面上的和諧現象、團結一致所迷惑，而要求政府更誠意的改革。

以固打制大學錄取新生的不公平制度，造成許多有資格的華裔子弟望門興嘆。進入大學之後，校園作者看到許多成績遠遠不如他們的異族同學，充斥大學校園，自己慶幸之餘，忍不住為自己的同胞打抱不平，莊松華在〈風雨之路〉中如此控訴：

想到還有千百個充滿報復和理想的學子被拒於門外，心中若有所失……你能說還不是命運在作弄人嗎？多少人望穿秋水，望斷天涯。望瘦了日日經過家門的灰衣使者，結果該來的不來，不該來的卻來了。多少人申請了又申請，上訴了又上訴，最終還是一場空。都說了等待是永恆的答覆，都說了名額有限的固打制度是不可能改變的，都說了龍遊淺灘被蝦戲。仰天望天，陽光已燦爛。是的，陽光燦爛。¹⁸

也有看到校園裡面出現如校園外的種族對抗，彼此之間的隔閡和成見，在校園生活中更顯而易見。感於不應該在高等學府出現的愚昧現象，在馬大的許育華在〈抹盡一路的血淚〉寫道：

我在這片清幽的校園來去三年，無助也眼看種族關係惡化的趨勢不停加遽。在大多數的情況下，每個種族的大學生都趨向自我群居；即使不可避免的碰面了，也往往視對方而不見，態度冷漠。可是，事情本來就是這個樣子嗎？

歷史告訴我們，許多人類的紛爭無非都因此而起，可是老百姓之間究竟有什麼仇恨呢？許多時候，都是因為我們愚昧無知，慘遭野心政客的任意擺

¹⁷ 〈序·歷史等著我們去創造〉，《有一座山》，頁2。

¹⁸ 莊松華〈風雨之路〉，收入《長廊迴響》，頁72。

佈，結果，淪為他們登上仕途的晉身階。¹⁹

在理大，種族的偏見和歧視也不遑多讓。原以為高級知識分子會有更寬闊的胸襟，來看待民族與國家問題，但是現實與理想往往背道而馳，祝家華在他的散文〈憂憂綠水〉中，表達了他的憂慮：

讓我們回頭看看大學這家園，原本是追尋真理、學術、知識的地方，如今卻是培養極端的種族宗教分子的溫床。就好比小學到大學，我們都被教導祖國是三大民族的國家，但是到了大學，我們精誠團結爭取獨立合作精神似乎被遺忘了，代之的是無數的種族偏見、歧視。²⁰

在這些作品中，內容血淚交加，訴盡族人內心的悲憤，除此之外，連題目也取得異常的悲壯，為族人不公平的待遇而鳴，為自身文化的多波折而吶喊，為四分五裂的社群而悲痛。他們希望族群能夠團結，寄望各政要為族人爭氣，力求文化尊嚴得以建立，更渴望前人在這塊土地上披荆斬棘的歷史受到承認。

另一方面，他們也把關心放諸國家上，他們渴望民主、言論自由、種族和諧、在各領域裡得到自由競爭的機會，做一個頂天立地，真正的馬來西亞人。禩素萊的〈沉吟至今〉，便是要傳達這樣的訊息。

〈沉吟至今〉是參加大專文學獎作品，在決審的階段，曾引起評審員的爭論。作者以激烈的感情，吶喊出身為馬來西亞人卻不受承認的憤恨。天安門六四事件時，她在歐洲，看當地中國人和外國人的遊行，作者想到的是在大馬發生不利華人的政策，她質問華文招牌事件、華小不黯華語高職事件、民主與大專法令等在大馬問題。文中的作者感於自己一心一意要成為大馬人，卻不如願的悲哀。當外國人問她身為中國人，六四悲劇令她傷心與否時，她說她「默默看著前面舉標語而過的人群，感情失落在不知的方向」，然後她再次、一字一句的答：「I am not a Chinese！」²¹。那是非常觸目驚心的咆哮，非常有震撼力的一篇佳作。

可惜大專文學獎評審委員基於觸及敏感原因，不便讓此〈沉吟至今〉獲獎。所幸該篇文章做後獲得第三屆花踪散文推薦獎，不致滄海遺珠。

內憂外患，固然叫許多校園作者憂慮，同時也刺激他們維護文化的決心。「風

¹⁹ 許育華〈拭盡一路的血淚〉，收入《長廊迴響》，頁12。

²⁰ 祝家華〈憂憂綠水〉，《熙攘在人間》，頁147。

²¹ 禩素萊〈沉吟至今〉，《吉山河水去無聲》，吉隆坡：佳輝，1993，頁24。

雨」越大，抗衡之心越熱。在八〇年代，馬大中文系的學生一度達到頂峰，與這種傳承文化的意識不無關係。馬大中文系學生出版的一系列作品中，傳承薪火的意識非常強烈，他們都有意識地將傳承文化當作己任。邱美珠的〈讓煙和火傳承下去〉，正是表達這類感情：

長久以來，我們一直都在接受所謂優秀文化的薰陶，但我們的心到底能不能像火一般的不停燃燒呢？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我們該做好是把這煙和火繼承下來，再把它綿綿不斷的傳下去，直到子子孫孫……²²

和「風雨」的作用一樣，「煙火」、「燭火」和「燈光」都是文章作品中常用的意象。「風雨」來襲會把「煙火」和「燈光」撲滅，「傳燈」成了一种傳承文化的儀式，也成了大專文化團體的信念。潘碧華的〈傳火人〉，把「中文系之夜」與傳承文化連結在一起，表達堅決的信念：

我已經記不得其他同學接過燭火的表情了，只記得大家的靜穆和激動，還有酸楚。明明我們只是在傳遞我們應傳的燭火，卻要加上一個委委曲曲的手勢，風應該是沒有機會越進來的呀！²³

八〇年代的校園作者不甘於文化活動受到各種限制，他們在創作之餘，也積極參與與推動校園文學活動。他們結社，辦文學活動、大專文學獎等，能夠看到中文和方塊語言在校園裡突圍而出，是他們最感到欣慰的事。

林添拱的〈一次歡愉的經驗〉便是寫出在馬大，可以看到揮春、文學雙週等中文性質的活動的興奮：

有一次，有中文字的宣傳海報貼在每一個學院的佈告欄上。有時候，從數學系的山丘走過來，經過早晨陽光可以曬到的理學院佈告欄上，看到圍觀的人群，我總是想：應該是這樣的啊！在馬大內我們退守到一角了，但我們是不甘於蟄伏的。²⁴

八〇年代的校園作者有意識地將民族文化、國家社會和自己的思想結合，以文字，發出八〇年代年輕一輩的心聲，有憤恨有寄望，風雨之後，那是非常珍貴的

²² 邱美珠〈讓煙和火傳承下去〉，收入《只在此山中》，頁71。

²³ 潘碧華〈傳火人〉，《傳火人》，雪蘭莪：澤吟，1989，頁144。

²⁴ 林添拱〈一種愉悅的經驗〉，收入《第一屆全國大專文學獎專輯》，檳城：理大華文學會，1987，頁32。

材料，值得馬華文學研究者重視。

六、結語

校園文學中的憂患意識在八〇年代下半年達到頂峰，進入九〇年代，憂患意識又有怎樣的發展呢？

步入九〇年代，大馬當權政府對中國和華人社會的政策有了改變。華人文化在這大氣候下，有了比較寬闊的發展空間。政府察覺，經濟效益明顯的比種族對抗更容易獲取人民歡心。

隨著政府政策轉變，經濟好轉，九〇年代的華社，憂患漸減，悲憤日淡，取而代之的是講求個人前途與經濟物質的保障，大專院校的學生意識也跟著這條經濟的路線改變。

另一方面，九〇年代的世界，轉而重視比民族、國家更為宏觀的課題，和平和環保更令人類關心。這種轉變也在馬來西亞出現，傳媒給予大篇幅的報導，作為「時代的眼睛」大專生，也不能避免地思考地球存亡和人類幸福的宏觀課題。

進入九〇年代，憂患意識不再是校園文學的主調，雖然如此，在八〇年代熾熱的憂患意識，在九〇年代初期還是獲得延續。當政策有了轉機，外患似乎漸遠的時候，內憂反而日益擴散。

一九九二年出版的馬大中文系學生的散文合集《鍾情11》哩，還可以看到憂患的成分，黃益村在他的作品〈峇峇情懷〉中這麼的擔憂：

四周非常寂靜，但檯燈仍舊亮著。在四周黑黝黝的映襯下，檯燈的光芒顯得那麼微弱渺小。我突然覺得恐懼，眼看著越來越多的家長不願送子女進華校；眼看著我們將舞獅為唯一的文化，會不會我們已開始步上另一條峇峇之路？²⁵

在九〇年代初期的校園作者，看到的是另一種隱憂，他們並沒有因眼前華文教育的光景大好，而自我陶醉。他們了解到族人重經濟輕人文的觀念，在不久的將來，將引發另一次的文化危機。

從八〇年代大專生的「孤憤抗衛」，到九〇年代的「低迷無助」，是一個值得

²⁵ 黃益村〈峇峇情懷〉，收入《鍾情11》，吉隆坡：李志成出版社，1992，頁56。

注意的轉變。讓我們再度來看屬九〇年代校園作者的劉敬文怎麼說：

紅塵的撩亂因為對社會、文化的體會越深而擴大，續而覺得肩膀的無力和軟弱。在高談論闊中，我們皆感功利氣息充塞如黃沙漠漠，而眾人皆沉睡在狂流洶湧中。雲開之前，我們雖有信心，但恐懼並未遠離。還好我們還能執筆，低回心頭的鬱結，勝於把荒流困罩心頭，裝聾作啞，無疾而終。

26

最能體現八〇年代憂患意識的校園文學，來到九〇年代，隨著時代的轉變，失去了澎湃的氣勢。即使是馬大中文系學生的作品，也少有描述憂患的情緒了。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文系師生合集《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》，除了少數幾篇觸及文化、民族課題，大部分作品類容傾向親情友情的描繪²⁷，與八〇年代出版的《讀中文系的人》和《只在此山中》的內容呈現有很明顯的區別。

文學作品中的憂患意識，歷史久遠，既不是始於八〇年代，也不會絕滅於八〇年代，這種優良的傳統還是會繼續傳承下去。

原發表1997；格式修訂2003

²⁶ 劉敬文〈絮語二則〉，收入馬大華文學會編《文學多重奏》，吉隆坡：馬大華文學會，1991，頁59。

²⁷ 見何國忠編《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》，吉隆坡：佳輝，1992。